

留连,批风抹月四十年

——叶盛兰往事（上）

◆ 章诒和

父亲（章伯钧）在反右运动中，直接连累的京剧名演员有三人。一个是李万春，另两个是叶盛兰、叶盛长兄弟。艺人哪懂政治，却被政治搞得头破血流。想到他们，父亲便叹息不已：“唱戏本来就苦，现在就更苦了。”父亲歉疚终身。他死后，这种歉疚感留给了我。

李万春和叶盛长赶上给右派改正，还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可惜了的是叶盛兰，他是屈死的。

叶盛兰(1914—1978) 汉,男,籍安徽太湖,京剧小生演员。

【背景·“富连成”】

提到京剧，就要提到“富连成”；提到叶盛兰，也要提到“富连成”，这是他的背景。他的一生，因它而光耀，也因它而屈辱。

“富连成”是啥？“富连成”是一个按传统规程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，始创于清末民初，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。学艺的学员出身梨园世家或来自苦寒人家。他们在严格管理和严酷到残酷的训练下，学习京剧。在几十年时间里，“富连



叶春善和夫人段氏

成”科班以管吃管住、又打又骂、边学边演的独特方式，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700多名有很高表演技艺的演员，日后他们成为中国京剧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。这个由私人开设的科班，可谓历史最长，规模最大，质量最高，影响最大。那时与“富连成”并存的还有一些京剧班社和学校，但连续几十年不间断地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且成绩卓著，“富连成”是首屈一指，至今也是首屈一指，别看现在有了高校性质的戏曲学院。

“富连成”学员按“喜、连、富、盛、世、元、韵”七字顺序，排列为七个科次。每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演员，用“星光灿烂”来形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“喜”字班出名的有陆喜明、陆喜才、雷喜福、赵喜魁、赵喜贞、武喜永六大弟子以及侯喜瑞。“连”字科有于连泉（小翠花）、马连良、马连昆、刘连荣、王连平、何连涛、方连元、骆连翔等人。“富”字科有茹富兰、谭富英、茹富蕙、马富禄、吴富琴、沈富贵、邱富棠等人。“盛”字科有裘盛戎、高盛麟、杨盛春、叶盛章、叶盛兰、李盛斌、李盛藻、刘盛莲、孙盛文、萧盛萱、孙盛武、贯盛吉、贯盛习等人。

“世”字科有袁世海、李世芳、毛世来、阎世善、迟世恭、江世升、江世玉、艾世菊、沙世鑫、刘世勋、裘世戎、王世续等人。“元”字班有黄元庆、刘元彤、郭元汾、茹元俊、谭元寿、哈元章等人。而搭班学艺的，则有周信芳、梅兰芳等人。这份名单基本上把京剧界的顶尖演员一网打尽。而“富连成”之所以取得极其丰厚的教育成果，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个人、两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，一个是社长叶春善，一个是管事的总教习萧长华。

这个叶春善不是别人，就是叶盛兰的父亲。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由一个富绅出资，叶春善从收容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，一手创办了这个京剧科班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打出“喜连升”的招牌，后因换东家改为“富连成”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叶春善患病，由长子叶龙章接替科班的工作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叶龙章因病不再问事，社务转由次子叶荫章主持。次年“富连成”解体。我为何在此不厌其烦、啰哩啰嗦介绍“富连成”？因为这是叶盛兰的背景。今天谁毕业于哈佛，谁就拥有一个最好的文化背景。如果拿它和“富连成”背景相比，前者不过是一所美国好大学，后者则是中国整个梨园行外加半部京剧史！这个背景，让叶盛兰的前半生灿烂无比；这个背景，让叶盛兰的后半辈子灾祸无穷。

说完了背景，再说叶氏家族。叶氏祖籍安徽太湖，乃梨园世家。中国戏曲史里，有“四大徽班”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进京献艺的盛事。其中的“四喜”班，在咸丰、同治年间有个非常出色的艺人叫叶中定，弟弟叫叶中兴，哥儿俩搭班唱戏。这个叶中定，就是叶盛兰的祖父。

叶春善1903年娶妻段氏，生有五子四女。长子叶龙章先在张学良东北军供职，1935年接替父亲任“富连成”社长。次子叶荫章为京剧武场鼓师（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称为武场）。三子叶盛章，武丑演员。四子叶盛兰，文武小生。五子叶盛长，文武老

生，娶妻谭小培之女谭秀英。长女叶玉琪，嫁名小生茹富兰为妻。次女叶玉琳，嫁老生演员宋继亭为妻。三女过继给四姨母，改名杨凤岐。四女叶惠蓉，嫁萧长华之子丑行演员萧盛萱为妻。另有一义女，叶萍。

叶家的第四代，绝大多数也从事京剧表演事业。他们当中不乏佼佼者，有的已是出人头地的名角儿。如叶盛兰之子叶蓬、叶强（后改名叶少兰），叶盛长之子叶金援、女儿叶红珠，叶玉琪之子茹元俊，叶惠蓉之子萧润增、萧润德。总之，叶氏家族从咸丰延续到今天，可谓树大根深；又与同为梨园世家的萧家、茹家、谭家联姻，子女众多，可谓枝繁叶茂，代代领风骚，家家出人才。

有了这样的背景，有了这样的出身，本人又有那样的天资和才情。你说，叶盛兰当是怎样的脾气和做派？

【虎 性】

他是甲寅年生人，属虎。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。从落地起性子就烈，喂奶稍微晚了点儿，就哭个没完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。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，功课若背不下来，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，实在困得不行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。到了科班，还是这个脾气。为了打好武功底子，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。每日中午，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。叶盛兰常说：“唱戏的没腰、没腿（即无腰功、无腿功），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。”



叶盛兰便装照

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，11岁入“富连成”社，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，便学旦角。青衣、武旦、刀马旦都拿得起。非但拿得起，还真都不错呢。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，英气有余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京剧小生人才奇缺，便改学小生。他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，发奋用功，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、袍带、纱帽、翎子、靠把，他全都学会了，唱做皆优，文武兼擅，加之人又敬业，每一场戏，都是全力以赴，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。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，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京，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，外表兼具北雄南秀。面庞白皙，两道剑眉通鼻梁，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。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，竟如深潭静水，潏潏袭人。

叶盛兰脾气大。这个大脾气，一直保留到1957年夏季。我曾问同事：“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？”

同事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是角儿，就都有脾气。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。”

【盯上了】

叶盛兰还在“富连成”科班效力的时候，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“盯上”他了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里的周瑜，并大肆宣传，厚给酬劳。这种名利双收的待遇，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。他的父亲、“富连成”社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“扶风社”大班演出，是多么风光体面。要知道，科班学生出科（即毕业）以后的出路，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。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，有“扶风社”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，待遇优厚，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叶家一口答



《群英会》剧照，马连良（右三）饰诸葛亮、叶盛兰（右二）饰周瑜

应。那年，叶盛兰刚满20岁。也就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起，到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整整合作了15个年头。那时的“扶风社”有马连良、张君秋、叶盛兰、刘连荣、马富禄，人称“五虎上将”，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。

也算“富连成”门徒的梅兰芳，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。1933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《奇双会》，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。上海观众说：“好些年了，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！”

叶盛兰喜阅读。他不看闲书，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，在对剧本的研磨上下过许多功夫。比如为唱好《监酒令》，他通读了《西汉演义》，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。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，非常感动。这出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，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巡夜用的红灯笼，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，便觉小气，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、气贯长虹的表演。于是，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订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。这宫灯，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。

【三张红叶】

1940年，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，声势浩大。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（京剧舞台装置，也称堂幕、台幔，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。绸缎或丝绒制，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，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。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，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）——天蓝色的软缎，上面绣了三只大红色的枫叶，象征着叶氏三雄（盛章、盛兰、盛长）。其中，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，号召力最强。年纪轻轻的，便锋芒尽露，光彩照人。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，都可圈可点。水牌子上（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）但凡有“叶盛兰”三个字，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。他的姓名，就是票房。叶盛兰的小生戏好，偶尔演个小旦，也棒。我是没看过，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，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《杀子报》（1949年后被列为禁戏），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（小旦）。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，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。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，真像个小姐姐模样。每演至此，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。他演的《木兰从军》也极好，又文又武，亦男亦女。现在没人会了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吴祖光曾问过我：“诒和，你看过叶盛兰的《南界关》（又名《战寿春》）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没看过。”

“那你就太遗憾了！”

“我看过他的罗成、周瑜、吕布，也不遗憾了。”

吴祖光说：“遗憾！没看过他的《南界关》，就都遗憾。”

经他介绍，我才知道：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，是反串青衣。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，又是十足的刀马

旦——讲到这里，吴祖光站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这一场的激烈程度，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，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。总之，叶盛兰即使反串，也是一流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，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【“育化社”】

京剧历史上老生挑班挂头牌（指戏班中有艺术造诣、有影响力、号召力的领衔演员，俗称挂



叶盛兰早年饰旦角秦良玉

头牌的、挑大梁的、台柱子，在广告、海报及演出牌子上其姓名及所演剧目均置于最显要处。演出时一般都演大轴戏），是名正言顺；后来顺应潮流，由青衣组班挑大梁。而抗战胜利后（约在1948年左右），叶盛兰在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以小生行当挂头牌组班演出了。这是他的雄心壮志，也是他的实力所致。他的班社叫“育化社”，意思是戏剧以教育感化为务。

自己当班主，什么都得担待着。好在他事无巨细，都责无旁贷，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。日常生活里，他脾气大，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。一次，他与程（砚秋）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《吕布与貂蝉》。演出头一天，票已售出过半。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，说：“貂蝉要唱八句〔慢板〕（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）。”

叶盛兰想也没想，便说：“自然的。”

过一会儿，来了第二个电话，说：“后面唱〔二六〕（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）时，我要舞绸子的。”

叶盛兰同意了，说：“好。”

晚上，又来第三个电话，说：“我不唱后面《白门楼》，那里的貂蝉是二旦（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）的活儿。”叶盛兰也点了头，他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，为此，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（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）。

为了艺术，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，故而开支相当大。票房收入虽然不少，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。到了1948年，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，有明也有灭。就在这样境况下，叶盛兰非常红火。可以说，他和他的“育化社”每唱一场，都费尽心思。

【名伶常态】

日常生活中，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，一表人才，只是他眼睛近视。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，那是表演，在做戏。在台下，因为高度近视，熟人、同事从身边过，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，无形中得罪了人。后经朋友劝导，他才配了眼镜。这样，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。

一次，齐崧先生（台湾京剧学者，尤以梅兰芳研究著称）在上海“飞达”西餐厅吃午茶，巧遇叶盛兰。“飞达”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，也是文人荟萃之所，和天津的“起士林”差不多。每至下午4点左右，宾客常满，仕女如云，后至者须站班等候。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，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。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？是否和三哥（盛章）在一起？

叶盛兰答：“我没有一定的落脚地儿，有约最好是到‘黄金’后台见面。”

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，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。望望那边的女士，齐又问：“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？”

叶笑着说：“我们刚认识不久。”

“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，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，可有此话？”



40年代叶盛兰便装照

叶盛兰红了脸，笑答：“七爷（即齐崧），怎么您也会开玩笑。我每天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哪儿还有空交女朋友呀！”

齐崧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少认识几个，就有功夫吃饭睡觉了。”

叶盛兰听毕，大笑。

二人握手告别时，叶盛兰说：“请您多捧场。”

齐崧看他面如冠玉，唇如涂朱，一袭笔挺西服，完全是个翩翩佳公子，心想有那么多漂亮的富家女性对他趋之若鹜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

总之，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。在这方面，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。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、把玩金石、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。而他们这一代，则以一半正经、一半玩世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。除了打牌、下烟馆，他们还穿洋服，喝咖啡，近女色，去舞厅，骑大马，牵洋狗，抽雪茄。上海小报说：“叶盛兰是台上台下，都有名角风度。”其实不单是他，很多的公子、阔

少、文人、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，台上风流，台下也风流。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，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，而并非堕落。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，就会知道：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。

叶盛兰22岁时，名成业就，经父母主张结婚，夫人刘氏，家中经营钟表。夫妻情笃，生三女二男。人谓“盛兰少年得志，妻财子禄四者皆备”。命运向他露出笑脸，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所以，他曾对朋友说：“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。”

【情分·义气】

梨园行重的是情分，讲的是义气。这情义二字，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，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。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，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，也更让人信得过。叶盛兰很懂得情分，很讲义气。20世纪40年代叶氏三兄弟（盛章、盛兰、盛长）到上海，在中国大戏院演出。按老板的“惯例”规定：戏班每月要演3期，每期12天，演够36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。这等于是在演足30个晚场后，另加6场义务戏。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，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，处心积虑地扣除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、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。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3元降为2元。

叶盛兰火了，他对三哥盛章说：“这样可不成！人家（指戏班同行）跟咱们哥儿仨出来，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。他们这样一来，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？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（即理论理论之意，北京土话），不能让大家吃亏。”说罢，他就拉着叶盛章找到经理，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3元。



《吕布与貂蝉》剧照
叶盛兰（左）饰吕布，
李慧芳饰貂蝉

经理不答应，叶盛兰急了，冲着他说：“经理，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。他们都拉家带口的，出门在外，就更为不易。您不能光顾赚钱，不管我们！如果您不涨饭钱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从今儿起，回戏（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，剧场临时停止演出，谓之回戏）！”

见叶盛兰真气了，经理便软下来，说：“四爷，您别发火，咱慢慢商量。”

叶盛兰说：“好，能商量就成。还是那句话，每人每天3块钱饭钱，少了不成。您不是怕赔钱吗？那好说，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，管保您赔不了。”

有了这句话，经理乐了。说：“好，好，就按四爷说的办。”

义气，这叫够义气。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，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（兰芳）老板。

据我所知，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，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，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。人如浮尘，游弋世间，因有了情义，才聚聚依依、温温和和的，也才有了人性。

【一声巨响】

1948年的年底，北平陷入了围城。物价飞涨，人心浮动，戏也就不好唱了。前途难测，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。大家凑在一起，常以打牌消磨时间，或麻将，或扑克。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。手里还有几个钱，他们的赌注就改成是“黄（黄金）、白（银元）、绿（美元）”。轮流在各家玩，其中，也有叶家。

1948年12月13日，这天下午，李少春、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。吃过晚饭接着打，到了11点多钟，突然一声巨



《赤壁之战》剧照，左起：马连良、叶盛兰、李少春

响，惊天动地，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。接着，电灯就灭了。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。不一会儿，灯又亮了。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接着打。到了凌晨1点多，再听到爆炸般

的巨响，电灯再度熄灭。艺人们面面相觑，谁也没心思再打了。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（今天的宣武区），彼此相距不远，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。唯有李少春、赵荣琛住得远点。从前的北京，一有个风吹草动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关城门。他俩一路行来，发现和平门关了，前门关了，崇文门关了……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。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，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。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。

1949年，政权易手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。对政治既不懂、也无多大热情的叶盛兰，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

择。戏是要唱的，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，已很难维持。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，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身说法，他选择了“国营”。1951年，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，而那时，他领衔的戏班“育化社”班并未解散，足见，他多少是在“脚踏两只船”。从收入上看，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为1300斤小米，这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。新政权自接管演艺事业，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。在业务方面，叶盛兰被排在一等，属于文艺一级。而要论政治方面，他的排位就靠后了。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，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。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：“我们跟组织商量、请示，决定把他吸收进来。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——这个人很不老实，我们也听说过‘叶四爷’的脾气，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。于是，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‘约法三章’。然后，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（在南夹道63号），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。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，就是一切服从组织；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，用今天话来说，就是努力改造自己；第三章是改革京剧。对这三章，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。”

【七年间】

政权的更迭，艺人可是见多了。他们地位卑贱，但都心存傲气。反正谁上台，你们都得听戏——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，也是使艺人的日子有着人生安稳、事业永恒的意味。

令艺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新政权刚刚建立，就立即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，统统由党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。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，简称“戏改局”，田汉任局长。而叶

氏家族上上下下、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党，他们感到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，并坚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对官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，也有了疑问和不满。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性，他不像某些翻身感极强的艺人，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。“富连成”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1957年的夏天，曾这样描述：“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色演员，架子都放下来了。唯有叶氏兄弟（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），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。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，老艺人也好，老演员也好，没有不靠拢组织的。单单叶盛兰不靠拢。”

那么，从1949到1957年，叶盛兰干了些啥？演戏。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、可也不一样。我说“一样”，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、长安等剧场演出。他唱戏，观众掏钱。我说“不一样”是指他的演出，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。比如，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，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，来往于枪林弹雨之中。又如，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，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表演。这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事儿。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，这在1949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。

【最痛快的一天】

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，发生在1957年夏季。

1957年的春天，既是共产党提倡的“鸣放”时期，也是各民主党派的大发展时期。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范围，主要是高等院校。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展范围是中小学教师。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发展范围是医药界。那么，文艺界呢？哪个党派都可以发

展。顿时，文艺界就成了八个党派抢夺的对象，特别是抢名家名流和名角儿。在民盟中央一向负责组织工作的父亲，立即以民盟中央的名义，把京剧界名演员“一网打尽”式地请到中山公园的“来今雨轩”吃茶，在谈笑风生中，向他们介绍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、性质、地位与作用。并说，如果他们能屈尊参加组织，那将是民盟的荣幸。听父亲说，那天除



1956年，叶盛兰在《群英会》中饰周瑜了梅（兰芳）、程（砚秋）以外，大牌名角儿能来的都来了，好不风光。父亲是两个党的负责人，农工党也要在文艺界大发展呀。于是，父亲一方面通过叶恭绰先生在国画界发展农工党的成员，另一方面，通过李伯球和我的母亲李健生在中国京剧院发展成员。

5月下旬，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，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。27日，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，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，同时提出两点要求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。二是希望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。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，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，当日下午便让母亲赶去和叶氏兄弟见面，双方的印象都非常好。特别是叶盛兰向我的母亲反映对中国京剧院领导的意见的时候，我的母亲痛快地说：“以后，你有什么意见谈出来，民主党派可以为你做主。”有了这句话，叶盛兰当即也就接过了农工党的申请表。茹元俊等人，也都先后表达愿意加入的意向。母亲还说：“参加共产党是光荣，



叶盛兰扮演的罗成

参加民主党派也是一种光荣。”艺人们听得心里热乎乎的。

6月5日，由叶恭绰、李伯球、李健生、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，后来，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。父亲和叶盛兰坐在一起，当得知叶盛兰也是安徽人的时候，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，父亲一生对家乡的情感似烈酒浓浆。二人见面就差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了。所以，后来在反右斗争大会上有人揭发说：章伯钧许诺叶盛兰在加入中国农

工民主党以后，可以举荐他做中央委员或政协委员。这话，我听了一点也不觉得是人家在造谣。父亲处在特别感情状态中是管不住嘴的，我也有这个遗传。为此，母亲伤透了心，常摇头叹息：“小愚进了大牢，也没改掉章家人的习性。”

在座谈会上，叶盛兰第一个发言。他说，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，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，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，不懂装懂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，工作一团糟。造成这样的情况，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。他的发言，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。他说：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《三打祝家庄》的路子搞，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？有一个剧种演《白毛女》就行了，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《白毛女》。难怪在宴会上，李伯球称赞叶盛兰“有周瑜气概”。而叶盛兰则对父亲说，自己佩服的人是大胆勇敢的储安平。

宴罢，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。初夏的夜晚，老树婆娑，柳丝低垂，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。心情颇好

的叶盛兰感叹道：“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。”

三天后即6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，“整风运动”由此变成了“反右斗争”。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、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，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，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、吴祖光的右派分子，成为章伯钧“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”。

祸之来临，疾如迅雷。

【叫他感觉这次运动有滋味才行】

批判叶盛兰的大会，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，有四五百人参加。从梅兰芳、欧阳予倩往下数，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。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，亲临会场。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大会讲话，把叶盛兰定为“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，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……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”。这个定性，令所有人暗自心惊。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，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。他的罪恶，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。众人皆知的“富连成”科班历史、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、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、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、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、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，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、思想反动、历史反动、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，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。于是，对他的批判，决非是一般意义的批判。这是借批判叶盛兰之名进行的对中国传统艺术体制、京剧传承方式、演艺规则、艺人习性的总清算。

扳倒这样一个有成就、有地位、有背景、有人脉的京剧大牌演员，这位副部长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叶盛兰的



叶盛兰在《探庄》
中扮演的石秀

本质。他说：“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和张伯驹之流，是利用艺人钻入京剧界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的。没有内应，他们是攻打不进来的。所以根儿还在我们京剧界……在旧社会京剧界本身就有阶级关系，剥削关系。有的人是有钱的，有的人是没钱的，有的是剥削者，有的是被剥削者。京剧和社会发生关系，基本上是掌握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手里，京剧团体也是按照阶级剥削关系建立内部的经济关系……叶家就是利用班社进行剥削的。”大概是觉得艺人觉悟低，文化也低，副部长便将定性为剥削者的叶盛兰，做了具体的形容。说：“1949年后我们买肉要排队，原因是大家都有钱买肉了。过去叶盛兰吃肉不排队，因为只有他才有钱，买得起肉……由于叶盛兰兄弟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不同，虽然旧社会一方面他们也受压迫，被看成下等人。但在下等人中，他们又是上层人物，就是我们艺人中的贵族。”

继而，副部长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叶家班，说叶家班的势力和影响还存在，必须将它彻底摧毁。台下的人都明白，所谓的叶家班就是指“富连成”科班了。他说，叶盛兰是想在京剧院独揽大权，不要集体，不要纪律，反对现在的制度，仗仗自己当家、做

老板的经验，一心惦记剧团的“企业化”。在鸣放期间，为恢复旧势力不择手段，单有叶家班的小圈子还不够，于是就要和章伯钧、农工党搞在一起。当时的中国京剧院的实际负责人是马少波，所以，副部长明确地讲：“叶盛兰没把党放在心上，反对马少波，骨子里是反对党，要把党搞掉。因为马少波就代表党。”并特别强调京剧界存在的严重的封建关系，落后行帮式的小集团。指出这些从旧社会带来的家族关系、亲戚关系、师生关系、朋友关系，到现在都没有改造成为新的关系、社会主义的关系。他说：“京剧界有些人的家庭很封建，很落后，经常打牌，借打牌聚在一起，讲坏话，散布流言蜚语，骂领导，骂党员，骂组织，搞小集团活动，一天没事聊到半夜。这是腐烂的污七八糟的家庭，是最坏的……现在又加上一条——挑拨国家的大是大非，在家研究怎样打倒共产党了。”

就是要整叶盛兰！副部长说得明白：对叶盛兰“要动大手术，不给麻药吃，叫他痛痛，叫他感觉这次运动有滋味才行。要让他想到：‘我这个少爷，这回可要老实了，我今后要服从党了’。”

我算了算，1957年的叶盛兰是43岁。风华正茂，比年轻有为的储（安平）先生还年轻啊，像珍稀之花，正红也正好。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，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。再说，叶盛兰毕竟不是储安平，他是个艺人。艺人向来靠直觉、靠感性、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。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，并认为官方制定的“戏改”政策和举措太不合情理。他说：“京剧来源于民间，它上过野台子，也进过宫廷，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宫廷。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。这么些演员，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？观众还是人民呀！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，而是该改的才改，优良的何苦动它呢？”在他眼里，极富才情的田汉也是个外行，新文艺工作者不能拿过旧剧本改改，就成了他们的革命成果。在舞台上，剧本是文学，表演也是



“富连成”旧址

文学，故尔，以表演为核心的“梅兰芳模式”才是戏曲改革的正确道路，而以戏曲文学为核心的田汉模式是不能接受的。在他的眼里，中国戏曲学校几年教下来的学生才会几十出戏，这

就是不如“富连成”科班。“富连成”学员起码能演200出戏，像袁世海这样的尖子学员会400出戏。可是要像今天的戏校这样传授下来，剧目越演越少的话，国宝（指京剧）必将不保。在他眼里，演员的唯一使命就是演好戏，成个角儿，而不是入团入党。在他眼里，剧团体制应和舞台体制一致，是以角儿为中心，演什么戏，戏怎么演，谁站当中，谁站边儿，这些事情得听角儿的，由角儿铺排的，不能听党员或党支部的，由党来管着。在他眼里，剧团不是行政单位，是营业的企业，不能像中国京剧院那样，100多演员供养200多干部。剧团的唯一宗旨就是能让演员唱戏，唱的戏还得叫座。无论演员还是剧团都得挣钱，挣大钱，不能老是政治学习，老讲组织纪律。在他眼里，演出到了钟点，就得开锣，不能因为有个中央首长光临或什么政治任务而推迟。正是因为叶盛兰这样看问题，所以他说自己在（19）57年的言论不是为个人，是“为戏曲界的解放”。所以他在鸣放期间，要“闹”，要“搅”，要把党员和党员艺人“排挤”走，要把“富连成”的人拉过来。一句话，叶盛兰要理直气壮地在“组织”和“集体”中寻找和恢复自己的位置，寻找和恢复戏班原来的性质和功能，把抹杀个人的无名历史恢复为个体生命的创造。

我又在想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叶盛兰可以比较清醒地看出戏

曲改革存在的问题呢？是他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吗？不是。他之所以能评判“戏改”的成败，恰恰是由于没有政治性思维，也没有政治立场，更无阶级标准。在叶盛兰这样的艺人心目中，美与丑，优与劣，精与粗，是艺坛上的唯一分水岭和试金石，也是判断艺术实践得失成败的唯一准则，故而有了一分清醒，二分客观，三分勇气。而他那不合流俗、不见风使舵、不落窠臼的个性，也铸就了生命中的悲剧底色。



批判会持续进行。舞台是供艺人表演的，现在成了对艺人的审判。——1943年梅兰芳蓄须明志时摄于上海

一切都明白无误，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自己已然不能左右，而是受到你所属社会的粗暴而蛮横的威胁，并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陷阱之中。一旦你所倚仗、依靠的背景消失了，衰亡了，那么，你的生命就会面临尽忠坚守还是妥协求生的考验。俗话说：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。已不飘荡江湖的叶盛兰，脖子上却挨了几乎断送性命的一刀。

【叫“富连成”的人批“富连成”·让熟人批熟人】

你要颠覆一个国家吗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挑唆和支持它的臣民造反。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“富连成”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。

第一个表态，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梅兰芳。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，也就是叶盛兰所说——一个“有职无权”的人。

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“有职无权”做了批驳性的解释。尽管是批判会，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、一口一个“盛兰”地称呼，依旧长者气质、坚守大家风范。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“有职无权”，说“凡属我院重大问题，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。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春，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，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，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，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？盛兰这样乱讲，引起许多误会，是完全不应该的。”人的本性和本色，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，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讳的。当场，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，说：“对于盛兰、盛长，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，给以坚决的反击。但是对于他们二人，还是要挽救……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。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，明天就要出发了。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‘败子回头金不换’的好消息。”

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。他既属于“富连成”，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，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。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，但人家告诉他：“田（汉）局长派自己的

车来接您，可在外面等着呢！”能不去吗？他去了。去了还不行，他还必须讲话。他说，叶盛兰、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，一个挂帅，一个急先锋，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，把共产党赶走，恢复旧戏班……提到“富连成”和叶春善，他声音哽咽，不觉泪下，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，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



萧长华（左）姜妙香（右）在后台

死呢！他一再规劝道：“唉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可是要知过就改。走错了道儿，及早回来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快上救生船吧！你们已然一身泥了，里外好好洗洗吧。好好交代过关，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（指叶春善）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。”萧长华的发言充满对英才败落的痛惜，这痛之声、惜之情，感动了许多人。

既是“富连成”科班出身、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，当属谭富英。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，头天他没出席，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。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，他说：“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，脱离了家庭关系。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（谭富英之妹谭秀英为叶盛长夫人）。我妹妹重着身子（指怀孕）。但那是小事，今天的事大，是政治问题，我要和叶盛兰、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。”讲到自己与“富连成”关系，他明确地说：“我的艺术不是从‘富连成’学的，我是在家跟我父亲学，后来又拜了余叔岩，我才有今天。”此外，谭富英还揭发了一个事实：“鸣放期间，叶盛兰曾说：‘我报仇的日子到了’。”——话少分量足，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“喊着要杀共产党”一样。

“富连成”出科的名净裘盛戎，也是必须站出来的。他的发言题目是《叶盛兰，人民在等待你回头，懂不懂？》裘盛戎说：“党还在等你，一直没给你登报。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？你心中也有数。一直在团结等待，迁就你，你不懂啊！”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“富连成”的“罪恶”。说：“我想谈谈学戏的感想。



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，在本馆子‘行戏’（行会戏的简称，指戏班为工商业、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）、‘灯晚’（即夜戏）演了三出，又在‘堂会’演出五出。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……解放后，党照顾了我，教育了我。我的房子是和谭（富英）先生排了一出《将相和》后买的。这说明是党给了我房子，给了我老婆孩子。”裘盛戎说的是事实。他红得晚；即使红了，也不像梅兰芳、马连良挑班，挣大钱。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脸的唱腔一样激扬：“张春华（武丑演员）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，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我说，没了整个戏曲界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”

上台揭发批判的，不下数十人。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，应有尽有。从革命老区过来的、又身为中共党员的老生演员李和曾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（老生演员）、李盛藻（老生演员）进剧院，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。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赴朝慰问演出时的表现。因为李和曾是按照组织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，每日打洗脸水、打洗脚水、铺床、扫床、找电炉子做饭。二人天天相处，寸步不离。这样李和曾就积累了这方面的“宝贵材料”。他说“叶盛兰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，动机是为了个人，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。”接着，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：如何贪生怕死，挑肥拣瘦。想演出才演出，不想演出就不演出。志愿军开欢迎慰问团大会，首长献旗，他不接；请他讲话，他说肚子疼。军人们想与他合影，他也不干。别人接了旗，他又不高兴。走路不坐大卡车，非要小汽车等等。赴朝慰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，在候车室里，叶盛兰对自己说：“你回去问问毛主席，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？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党。”应该说，李和曾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射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。因为在这一场政治运动中，李和曾与叶盛兰的个人恩怨就等于是改革与保守的对决、接受党的领导与抵抗党的领导的大是大非了。

【清算一个人的罪行，首先清算他的历史】

要打倒一个人，一个重要招数是搞臭他的历史。清算一个人的罪行，也首先从清算他的历史下手。有了这样的战略部署，艺人纷纷揭发1949年前的叶盛兰，是如何地吃喝玩乐，腐朽堕落，横行霸道。和批斗罗隆基一模一样，开车的司机也上了台，揭发叶盛兰生活中怎么摆谱，说：一定要把小轿车停在叶家门口，差几米都不成。有一次接叶盛兰到文化部开会，司机告诉他马少波院长已经在车上了。不想正在吃早点的叶盛兰继续慢条斯理地吃他的早点，让党员领导干部在车上等了一刻钟。剧院的管理人员则揭发他为自己的化妆室一点挪动，而大发脾气、数日不上班的恶劣表现。

没有事实可揭的人，就进行批判分析。其中一个演员说：“解放七年了，请你参加无数次的国宴。我就纳闷，怎么不如章伯钧请你吃一顿饭？他给你的感受就那样好？什么菜那么香？我想了想，大概就是三样，两菜一汤。第一个菜打开盖儿一瞧，反党；第二个菜是反社会主义；第三个是汤，是反人民。就是这三样菜，撑得你胡说八道，你从此找到了靠山，说‘自己活了40年，那是你最痛快的一天。’”

头顶着万丈阳光，可眼前物是人非。一旦涉及自身，嘴脸何以变得如此不堪。看到台下熟人那没有表情的表情，外表平静的叶盛兰，心底当有怎样的狂乱？他在《白门楼》里，能以抑扬凄婉的歌吟表达吕布被擒后的惊惧、悔恨、悲怆的复杂心境。可现在呢？无可开口，也无口可开，连个三国的吕布都不如。跋涉复跋涉，追寻复追寻。胼手胝足，荆棘满衣，如今风雨骤降，而这风停雨歇的终点又在何处？（待续）